



土门关叙事

刘江滨



与山海关、居庸关、雁门关这些赫赫有名的雄关相比，土门关，一如它的名字，有些土头土脑，并不起眼儿。然而，拂去岁月堆积的层层尘埃，土门关的底色不由得让人投去温热的目光。

我最早闻知的不是土门关，而是土门村。我大学同学同舍的许建平就是石家庄市获鹿县（今鹿泉区）东土门村人。土门村因一条河穿村而过，被分为东土门、西土门两个村子。这条河曾叫鹿泉河，而今叫太平河。

在我们就读的河北师大，晴天的时候，西望可以看见一脉山影，那山叫莲花山，许建平的家就在山脚下。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周末，他带着我们十来个同学春游，去爬莲花山，先到了东土门村他家歇脚。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山村，高高的石台阶，结实的石房子，街道也铺着石板，这和我老家的平原村庄大不相同，给我带来鲜异的感受。那时并没有留意到土门关的存在。

四十年后的初冬，我和妻子专程来游赏土门关。这日天空蓝得出奇，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从石家庄市驱车到这里，只用了三十多分钟。在东土门村的土门关阁楼前，我忽然想起许建平就是这个村的，便问路过的村民，知道许建平的家在哪儿吗？村民用手指，这就是啊。原来和土门关阁楼紧挨着右手第一家就是许建平家！我走近了细瞧，建平家街门楼气派高大，墙壁瓷砖上标有“民宿”字样。我有点傻眼，努力寻找着，打捞着记忆，对此处模模糊糊有点影子，但土门关就矗立在他家门口，怎么没有半点印象？当年真是视而不见啊，这让我为少时的知识贫瘠、历史意识匮乏感到羞愧。

土门关现存阁楼三座：东土门西阁，西土门东阁，西阁。东土门西阁即建平家门口这个。阁楼分上下两层，底层由青石垒砌，上面是砖木结构的殿宇，中间是拱券门洞，上方匾额刻有“三省通衢”几个大字。门洞的路面铺有石板石刻，已凸凹不平，光滑发亮，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印清晰可见。从门洞的宽度看，通过小轿车是没有问题的。这座阁楼重建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雍正八年（1730）部分重修。靠墙有两通石碑，其一上刻“镇威述先阁碑记”。阁楼左侧有一棵树龄六

百年的老槐树，上溯一下时在明初。古槐树冠庞大，有数根柱子支撑着枝干，细密的叶子驳杂着枯黄，但绿意依旧浓郁。老槐树与古关阁相得益彰，分外适配，默默宣示着光阴的幽远与沧桑。

我给建平兄打了电话，说，在你家门口呢。许建平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又读了复旦大学博士，后任上海交大教授。他在电话里说，小时候经常爬上那棵老槐树，逮鸟捉蝉；高中毕业时，门洞上的阁楼做了生产队的仓库。他当过保管员，拿着钥匙，热天在阁楼里睡觉，通风透气，特别凉爽。土门村是驻扎守关的官兵代代繁衍而逐渐形成的村落，后来又陆续进来了商人和官人。何以叫“土门”？并县东北至土门关这一狭长地带，峭壁陡峻，“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近有十里土沟，隘口如门，“悬车不可度，一夫力能抗”，故名土门。按照建平指示的方位，我们走到西土门西楼阁以西，果然看到道路一侧仍然耸立着高高的土壁，就是以前所谓的土沟了。

建平兄曾应邀为故乡《东土门村志》写过序，为此他对土门关做了一番研究。过后他将序和有关资料发给我，我又查阅了有关史书，土门关的眉目身世一点一点清晰鲜活起来。

由土门关我不禁联想到国庆假期去过的山西雁门关。雁门关高耸于山巅之上，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有“中华第一关”之称，无论从险峻、格局、规模、大小等哪一方面比，土门关都显得太普通了。然而，古中国“天下九塞”，雁门关与土门关均赫然在列，二者可相提并论。当然，《吕氏春秋》记的是“井”，并井关，不过《唐书·地理志》云：“镇州获鹿有井陘关，又名土门关。”《辞海》亦云：“并井关，又名土门关。”实际上，并井关是太行八陉之一，“陉”指的是山脉中断形成的峡谷通道，在这个通道中，娘子关是并井西口，而土门关则是并井东口。西土门东阁与西阁拱门上方的匾额，分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题刻的“山辉川媚”，崇祯十一年（1638）题刻的“山陝通衢”。这些都说明，土门关是从陕西、山西到河北的必经之地，它和并井的秦皇古道一脉相承，当年秦始皇东巡以及死后返回咸阳，都得打这里经过。从军事上讲，土门关是连接山区与平原的咽喉要道，战略重地，历朝历代都有重兵把守；从商业上讲，店铺林立，货钱盈街，商贸辐辏，熙来攘往，形成一个热闹繁华的“旱码头”。

土门关那狭窄的门洞里吞吐过几多历史风云，那光滑明亮的石板上又叠印过几多人物足迹，已不可胜数。其中，韩信“背水一战”和颜真卿《祭侄文稿》的故事最令人难忘。有战功赫赫，亦有血泪斑斑。韩信的“背水一战”与项羽的“破釜沉舟”，皆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典战例。鹿泉以土门关为中心，流传着许多韩信这位战神的传说。“鹿泉”也是因韩信在此找水射箭白鹿麋然泉涌而得名。公元前204年，韩信率兵攻打赵国。赵国在土门关屯兵二十万，高参李左车建议统帅陈余坚守土门关，他率领三万士兵截击汉军辎重粮草，令汉军进退维谷，可大获全胜。但陈余不听。韩信背水列阵，引诱陈余倾巢而出，又悄悄派两千人在赵营遍插汉旗，令赵军大乱，遂前后夹击，赵军大败，陈余阵亡。“背水一战”的经典之处，不仅表现了韩信用兵决绝的勇气，还有巧使计谋的智慧。

大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一篇短文多处涂涂抹抹，显然是在极度悲愤痛苦的状态中草成，是血泪交迸写出的至情至性的生命之文。文中两次提到“土门”：“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震。”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平原太守颜真卿与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准备起兵讨逆，颜杲卿之子颜季明充当二人之间的信使。当时的土门关为安禄山义子李钦凑和副将高遵率兵镇守，土门关属常山郡（今正定）管辖。这日，高遵到范阳办事去了，颜杲卿设计将李钦凑骗到常山，趁醉杀了他，随后又擒获高遵，一举控制了土门关。逆贼的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帝都长安的危机稍稍得以缓解。安禄山派史思明回兵围困常山，颜杲卿父子城破被俘，先后被残酷杀害。两年后，颜真卿让人找到了颜季明的头骨，为之安葬，后泣血挥泪写下这篇传千古的不朽祭文。令人悲叹不已的是，颜真卿七十七岁这一年，唐德宗受小人蛊惑，竟派这样一个老臣赴叛将李希烈军中招安。在百般威逼侮辱面前，颜真卿义正词严，不改气节，被叛兵勒死。欧阳修赞其为“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祭侄文稿》传世的不光是文与书，更是熠熠生辉的气节与人格。

唐代诗人杜甫，饱经安史之乱的流离之痛，目睹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写出了赢得“诗圣”桂冠的伟大诗篇“三吏三别”。其中《垂老别》写到了“土门”：“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鄜城下，纵死时犹宽。”颜杲卿智取土门，郭子仪与李光弼出土门、拔常山郡，平定河北，都煌赫一时，胸怀天下苍生的诗人自然要把关切的目光投向土门关。

宋代文豪苏轼任定州知州时，工余闲暇来土门游玩，留下“千峰右卷矗牙帐，崩崖凿断开土门”和“豁豁土门口，突兀太行顶”的诗句。在他眼里，土门关是一处危岩险峻的所在。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句名世的金末诗人元好问，晚年卖书购得吕氏园，在西距土门关约三公里的白鹿泉隐居，六十八岁病殁于此。另外，明代顾炎武、清代谭嗣同等都在土门关留下了足迹和诗句。

近代石太铁路及公路的开通，土门关“三省通衢”的显赫地位由此如明日黄花，杳如黄鹤。土门关不再是关塞，也不再是旱码头，而成了两个普通的自然村落。那座孤零零的阁楼被遗忘在一隅，默默地与古槐厮守相伴，被当仓库或储藏室之用。四十年前我对其视若无物莫非暗含着一种隐喻？

诗，不只在远方。如今土门关在沉寂中又恢复了繁华与热闹，以另外一种方式。当地在土门关开发建设了一个驿道小镇，古色古香、弯弯曲曲的小街散落着饭铺、作坊和文创产品店，摊位上摆着麻花、江米条、烧饼、咸鸭蛋等各类小吃。街口耸立着一座二十二米高的瞭望塔，登上高塔，举目四望，土门关的山川形势尽收眼底。

时间塑造了空间，岁月改变着世界。往日士兵的厮杀声、商人的吆喝声、杂沓的脚步声、辘辘的车轮声，都已湮没无闻，似乎不曾有过。但消逝的历史不是虚无，它不只存活于泛黄的纸页里，不断修缮的遗迹中，还化作底蕴与魂魄付与当世。在此意义上，土门关在古代是关塞通衢，在当今何尝不可以当作一道心灵的驿站？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集中力量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对民众的思想革新亟待提上日程。据资料记载，天津解放初期，“全市有娱乐场所一百五十二家，相声、曲艺工作者有两千七百多人。剧中京剧、评剧、越剧、秦腔、梆子、大鼓、相声、杂技、魔术等。每天观众近十万人，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通过戏曲、曲艺改革以教育民众、提升民众思想水平是这一时期我党的文化方针。文艺小报《星报》应运而生。

《星报》创刊于1950年2月16日。最初是三日刊，从1950年9月14日起，改为每日出版，四开型日报。由天津市文化局主管，阿英担任主编。阿英是一个有着多方面建树的作家、学者，他不仅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本身也比较懂戏剧。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创作了诸多历史剧，戏剧研究的理论与批评也都拿得起。主编《星报》期间，阿英秉承包容平和的办刊方针。创刊伊始，《星报》就提出：“这是以新的内容，新的风格，新的趣味贡献给读者，并和读者结合的报纸。”“我们也讲究‘趣味’，但不是‘低级趣味’，我们为读者‘娱乐’，但不是‘色情娱乐’，我们注重‘消息’，可并非‘桃色新闻’，我们有‘杂感随笔’，却不载‘吃语狂言’……我们希望通过这张小报，和读者共同在实际生活中，来建立健康的、新的趣味。”同时还指出：“文艺活动”是我们的主要课题，但也涉及文化、艺术等其他方面。必要的时候，还将谈时事。“这是草木虫鱼，我们也愿津津乐道，只要其中有‘道’。不拘泥于一定的格式，不拘泥于一定的范围，只要于人民有利，都可以去谈。我们希望能尽量地做到轻松、活泼、趣味”。《《开场白》》从中可以看出，《星报》的创立是要去天津一些小报过往的陈规陋习，帮助民众建立健康的文化趣味。《星报》涉及的文艺种类非常丰富，包括京剧、相声、评剧、话剧、秦腔、电影、文学等；栏目设置有文艺新闻、艺人访谈、长篇连载、理论文章、剧评、影评、曲艺作品等，琳琅满目。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的文化政策比较宽松，关于旧剧革新是仍在探索的领域，许多问题都存在争论与存疑之处。因此，《星报》上刊登了大量探讨戏剧变革的理论文章，主要有戏剧家马少波开设的专栏《戏曲改革漫记》，阿英亲自捉刀的专栏《剧艺日记》等。这些文章的主题包括旧戏如何进行修改、建立戏码检讨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正确执行“推陈出新”的方针等，多是从理论层面具体阐释国家的戏曲改革政策；除此之外，《星报》特别加强了评论力量，专门聘请相关专家撰写剧评文章，对正在上演的剧目做实时点评。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署名“少若”的一系列文章，《谈永春剧团演出的〈野猪林〉》——对李万春先生忠实的建议》《三打祝家庄》观后感》《因人添戏的例子——谈〈新花木兰〉里的两场戏》《看华编皮黄本〈窃符救赵〉——金城银行文团演出》《略谈〈太真外传〉》《再谈〈战太平〉》等，多能从历史和艺术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坦率诚恳地指出旧戏改编过程中的优劣、文章切中肯綮，现在读来依然不过时。马彦祥先生的专栏《读剧随笔》也属于此类。这些专栏还经常围绕新上演的剧作展开学术争鸣，营造了一种切磋琢磨的良好氛围。此外，戏剧家洪深先生的专栏《演技漫谈》、南开大学教授华粹深先生谈论梨园掌故的专栏《梨园旧事》，著名历史学家谢刚主的系列散文，都木业有专攻，文字又简洁古朴，令艺人和读者受益匪浅。

这种变革也需要文艺界人士的支持。乍逢新旧社会剧变，有的人起初因某些隔膜而对政治比较抵触，陷入了生活困境。阿英想方设法为他们谋出路，比如为刘云若的长篇小说《云破月来》开辟专栏连载，刊登官白羽的自传《生之磨炼》以及文章《白面恩仇》等；此外，几乎每期都会有各个领域的艺人专访，梅兰芳、慧慧珠、常宝莹、尹寿山、富少舫、侯宝林、孙玉奎等诸多名家都曾是《星报》的座上嘉宾。虽然有的连载后来因种种原因中断，但阿英对文艺人士的尊重与真诚使得《星报》周围团结了大批旧艺人，为戏曲、曲艺改革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戏曲、曲艺变革的推进离不开新的剧本。《星报》专门刊登了许多改编或新创的曲艺作品，为艺人和读者提供参考。例如赵佩茹和常宝莹改编的相声《新灯谜》《封建婚姻》，旧剧新编《打刀》，大鼓书词《小两口争灯》等。而《怎样写鼓词》（石化玉）、《怎样写剧本》（钱小惠）等文章则是通俗详尽地指导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指南。

《星报》开门办刊，非常注重作者和读者的反馈。曾专门收集了旧艺人对报纸的看法，并以《给〈星报〉提意见》为题刊登，后期的栏目都集思广益地进行了相应改进；设置了“艺人园地”专栏，反映艺人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还为普通读者开辟了“大家谈”栏目，“关于学习、时事、青年修养、婚姻、恋爱、文学、戏剧、音乐……你有什么问题就问，有话就谈”，期望群众踊跃参与。

《星报》把艺人、作品、批评、理论、政策指导和群众反映集为一体，能从大家关心的具体问题出发，又尽力容纳了文艺生产链条上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受到大家的欢迎，其影响力日益扩散至全国。今天来看，尽管时间短暂，但它以稳妥的方式推进旧剧改革，不搞一刀切，既去除了旧文艺中那些落后成分，又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天津这片深厚的曲艺土壤上开出了朵朵新花。《星报》是天津解放初期推进戏曲、曲艺改革当之无愧的前沿阵地，其办刊模式对当下戏曲、曲艺文化的革新与发展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星报》与戏曲曲艺改革

王云芳

《星报》与戏曲曲艺改革

王云芳

满庭芳

第五三四期

现代人外出，尤其是坐在动车车厢里，低头的居多，抬头的见少，大多忙着看手机、刷微信，看着看着，便透出了许多疲惫，一脸倦容。经不住劳顿的人，眼皮一沉，便进入了睡梦中。对于这些人来说，车厢外的风景是被忽略了。这种时候，山水风光，自然景物，人文景观，倏然之间似乎就褪到了生活舞台的背后，失去了想象的轮廓。

当然，也有例外，有人会一门心思地看着车窗外次第而来，又次第而去的风光。这风景，在我看来，是无风不景。这里的风景，是一种运行的状态，一种飘忽的

就会落到窗外。那快速退去的风景，总会轻轻重重地触动我的心弦。

风景有远有近，白天，无论晴和还是阴雨，透过车窗玻璃，有心看近处的风景，感觉永远是清新的、明艳的、欲滴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如一丛花娇明媚，似一汪水醉人心魄。远处的风景则有些不同了，如果是晴天，可以感受到的，是天空的深邃，云絮的飘逸，山峦的辽阔、遥远；如果是阴天或雨天，远处的天空、云絮、山峦便混沌在一起，凑成一个色调了。这色调，或黛青，或灰蒙，或淡墨，或积或晕，演绎着中国山水画所特有的姿容。这时候，在动车上放眼望去，天边密集的黑云似在无言地澎湃，激越地奔涌，颇有排山倒海、铺天盖地的气势。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我在动车上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汹涌的云层好像有心打开了一个豁口，在周围山头被阴霾笼罩的时候，一柱金色的阳光照射在一片危崖上，那片危崖刹那间呈现出富丽堂皇的金黄色调，美丽绝伦，让人忘情之间不由得就啧啧连声了。那种美，恰似一次强烈的撞击，足以洞穿一个人的心灵。

如果是晚上，在车厢内灯光的映照下，窗外一团漆黑，我会静下心来，听动车掠过铁轨的声音，那声音，是一种连续的、具有音乐特质的叩响，让人心无杂念，让人感觉踏实而平静。黑暗中，我分明听到了明明灭灭的人生风景，这风景，来自外在，也来自心灵。

坐在动车上看风景，风景有远近，心境有远近。近处，是快风景；远处，是慢镜头。快，是因为近处的风景总一闪而过，在视网膜上暂留的时间不过就是一两秒；慢，是因为远处的风景连绵在一起时，相对于一掠而过的快，自然就有了慢的感觉。在这些快风景或慢风景中，有我们亦熟悉亦陌生的山水、田园、村庄、道路、城市、高楼……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的人生才有了笃实的去处。

动车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何尝不是时光深处一抹动人的风景？它背负着向前方奔驰的使命，又承载着或悲或喜的生命负重，更承载着或快或慢的人生节奏。

不一样的风景在路上，最美的风景也在路上，路上邂逅的风景，是动态十足的风景，最有可能深入一个人的心灵。

每当我坐在动车靠窗的位置，目光

程应峰

坐着动车看风景

坐着动车看风景

坐着动车看风景

寿丰面粉公司应市场需求而生，在发展、因存中重技术、求质量。20世纪30年代，寿丰成为华北最大的面粉企业。寿丰面粉公司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前身寿里面粉公司，改组后的三津寿丰面粉公司，合并后的寿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寿丰面粉公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津工业文明的进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向中国出口的面粉数量骤减。面对庞大的市场需求，各地的面粉企业纷纷兴起。看到天津的面粉需求和日本长芦盐运使的朱勤斋（另说为朱清斋）和日本三井洋行的森格（另说为森格）等，于1915年共同创办寿里面粉公司（另说为朱勤斋向日方借款创办公司），厂址在旧意租界河沿马路（今河北区海河东路的一段）。寿里面粉公司使用桃牌商标，这一商标被之后历次重组的寿丰面粉公司沿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寿里面粉公司的产品因为日资受到抵制。借此形势，另一位也曾担任长芦盐运使的李宾四，联合佟德夫与日方交涉，还清日方资金、收回寿里面粉公司。李宾四出任经理，佟德夫分管生产。1921年，面粉厂扩建。

1923年，意租界因为烟尘问题要求公司拆除蒸汽机改用电动机，据《天津市面粉业调查报告》记载，“因在租界境内，居民聚集，烟雾灰尘，有碍公共卫生”。但是，因为电动机故障频发，无法正常生产。经历了重装蒸汽机延误工期和面粉价格下跌等挫折，公司陷入困境，后停业。

1925年，经三津磨坊同业会的面粉行业领头人孙俊卿、杨西园与佟德夫商议，向各米面粉发起集资，将公司改组为三津寿丰面粉公司，沿用桃牌商标。倪幼丹任董事长，孙俊卿任总经理，佟德夫任经理，杨西园任副理。三津寿丰面粉公司在他们的精诚合作中蓬勃发展。鉴于此，1926年，倪幼丹将大丰面粉公司也交给孙俊卿、佟德夫和杨西园管理。

1933年，改组后的大丰面粉公司，也就是新的三津永年面粉公司与三津寿丰面粉公司合并。寿丰又收购了民丰天记面粉公司，三家公司联合组成天津寿丰

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寿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面粉企业。据金城银行总经理处天津调查分部编的《天津粮食业概况》，1933年到1936年四年间，寿丰全年生产量在天津面粉厂全年生产量占比例分别为53.5%、68.6%、67.9%和71.2%。

寿丰的发展壮大，除了得益于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公司内外良好的人际关系、专业的原料采购、面粉销售和工厂管理等，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注重科技的眼光、科技人员的培养和设施配套等。

寿丰面粉公司不仅高薪聘请美国鲁夫鲁夫工厂工程师韩伯杰担任制粉技师并传授相关基础知识，还

另外，寿丰面粉公司厂内设有化验室，能随时协助调配面粉配方。据《天津市面粉业调查报告》载，三津寿丰面粉公司“设化验室一所，专司化验面粉所含之水分、灰粉量多寡，及发量吸水量面粉筋之大小”。调查报告中的其余几家面粉公司，则不设化验室，有需要时则委托寿丰，如民丰年记面粉公司“无化验室及机器，遇有化验时，往往托寿丰代为化验”。据《创制桃牌面粉的寿丰人》载，寿丰不仅化验本地小麦，“还化验华北、江苏以及进口的加拿大、澳洲、阿根廷等外国小麦的各项指标”。

依靠高于同僚的技术，寿丰面粉公司致力于追求面粉的高质量。据《创制桃牌面粉的寿丰人》载，寿丰的化验室会对小麦进行预先化验，以制定搭配的百分比。据《天津市面粉业及其同业公会》载，寿丰面粉以北方小麦为主，筋力本就比南方小麦好，再加上“搭配得法，所制出面粉柔软而富有弹性”，比其他产地或公司的面粉吃水更多，做出的产品分量亦更多。因为品质优良，即使价格略高，也深受民众喜爱。

在天津市社会局1932年1月出版的《天津市面粉业调查报告》中，有一张《天津面粉业一览表》。其中，罗列了六家面粉公司的厂房面积、资本、机器总值、年产量和工人总数等信息。其中，三津寿丰面粉公司既不是厂房面积最大的，也不是资本和工人总数最多的，但却是机器总值最高和每年产量最高的。寿丰面粉公司对科技和质量追求，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之后，寿丰面粉公司也延续了注重科技的传统。据《人民公园史迹》中《百岁老人话说人民公园》一文，郭万鹏老人回忆自己在1939年到“孙冰如先生任厂长的寿丰面粉厂任工程师（专业为小麦制粉、锅炉、自动化）”。

在当时变乱的时局中，寿丰面粉公司虽持续遭受日商逼压、交通不畅、物价飞涨等多重磨难，但始终坚持在天津发展、经营。新中国成立不久，寿丰面粉公司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

津派文化与近代化(四)

重技术、求质量的寿丰面粉公司

魏淑资

邀请相关专家指导讲学、聘任归国技术人员为质量化验师。寿丰面粉公司培养出了天津第一批专业制粉技术人员，初步摸索出了自己的技术人员培养体系，准备了后备技术力量。据《创制桃牌面粉的寿丰人》记载，寿丰资助孙明德赴德留学，回国后在寿丰任职。另外，还培养出了技师杨文焕、韩凤藻、马兆彭等一批技术人员。他们在各地的面粉工业发展中发光发热。

不仅如此，寿丰面粉公司的技术人员还积极钻研制粉设备的修理和制造技术。《天津市面粉业调查报告》中称：“机制面粉业，为津市工业中，最少参加人力者，属于轻便工业，妻子自具机器后，可不再假人力，即得洁白之面粉。然经过之机器则较他业为多”。较多的机器产生较多的修理任务。寿丰面粉公司专门成立了机修车间，不仅把送到场外修理变为场内自行修理，还逐步试制出制粉机器。这直接推动了天津机器工业的发展。寿丰面粉公司由此在技术领域走在同行前列。

思绪，一种看得见的时间跟进。有了风，便有了风光、风韵、风味、风情……景可以是静的，但风景一定是变幻的、流淌的、有无限回味的空间。风景也许在视网膜上只能短暂停留，却可以融入一个人的内心，引人再三回望。

俗话说，树大招风。而我以为，有了风的磨砺，生命才有了迎风生长的可能，才有了更为茁壮的空间，生命的情景才可能变得更加活泛，更显灵性，更为生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可以理解为一份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摧残，或许也可以看成是对壮观风景的另一种礼遇、另一种诠释。

每当我坐在动车靠窗的位置，目光

题图摄影：徐庆举

洁上丛话

洁上丛话

洁上丛话

洁上丛话